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39 期（民國 92 年 3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利用與被利用：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之關係

黃自進*

摘要

孫中山欲推動革命，需要基地，需要財源，也需借重國際化的現代化經驗，這些都是他樂於接受日本援助的理由。也因日本政府的支持，孫得以收編中國南方的各秘密會黨，奠定了他成爲秘密會黨代表的領袖地位。所以，從孫中山的角度言，中國革命能夠成長與茁壯，日本確有實質的貢獻。對日本而言，甲午戰後，東洋大國的舊中國形象，仍舊深植人心。再則，1896 年當中俄兩國已締結軍事同盟條約之傳聞，在國際社會廣被渲染之際，更使日本惶恐不安。爲了預防清廷政府的報復，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以便牽制清廷，便成爲日本政府的國策。

正因爲雙方關係之接合，是基於各自利益的考量。因而，客觀情勢的變遷，即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是雙方關係面臨調整的第一步。1905 年的日俄戰爭，是第二步。

義和團之亂使日本政府深信清廷已病入膏肓，再也不足爲心腹之患。但鑑於中國已淪爲次殖民地，在列強紛紛進入中國爭相角逐建構勢力範圍之際，爲了避免西方列強在蠶食中國後進而直逼日本，提倡中國領土完整，即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成爲此時刻的日本對華新政策。由於新的對華政策轉變爲扶植清廷恢復國內秩序，寄望中國能成爲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此一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正式切斷對孫中山的援助。

日俄戰爭的結果，讓日本勢力進入中國。如何繼續拓展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就成爲日本政府的新指標。爲了順利執行此一新目標，日本政府開始放棄提倡中國領土完整政策。此外，更以扶植清廷執政爲首要考慮。換言之，當蠶食中國領土主權已成爲日本政府既定國策時，日本政府當然不希望中國有所改變。是以，腐化的清廷政府，最足以滿足日本政府的所欲所求。爲了維護清廷的執政，日俄戰後的日本政府開始逐步鎭壓以日本爲基地的中國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可分爲兩個階段：前期是保皇政策，這是延續日俄戰後以來的一貫政策；後期是利權外交，日本政府以「貸款」爲餌，誘使南京政府出賣長江流域之商業特權。

不能順利爭取到日本政府的實質援助，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期被逼與袁世凱謀求妥協的關鍵。日本政府不能趁孫中山最需外援之際，與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建立起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也促使雙方關係一直停留在吳越同舟的瓶頸，完全沒有突破的空間。

關鍵詞：孫中山、日本政府、辛亥革命、義和團、日俄戰爭

一、前言

在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裡，日本對於提供革命基地以及培養革命人才，有最直接與最具體的貢獻。日本朝野對於中國革命的奧援，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是，這種合作的友誼關係，僅見諸早年的中國革命運動，在爾後的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終不復見。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關係的演變，正是這般景況的例證。本文即擬以利用與被利用爲研究線索，就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如何從支持發展到反對的演變過程，進行探討。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與日本政府關係的演變，大致可以區分爲以下三個主題：

第一，孫中山爲何會選擇日本做爲中國革命的基地，而日本政府又爲何會樂意支持孫中山。

第二，日本政府爲何會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從支持轉變成反對，有那些因素導致此一轉變。

第三，日本政府對孫中山反清革命運動的支持與否，對孫中山的個人事業、中國革命的走向以及近代中日關係的發展有那些具體影響。

本文即針對上列三個主題，逐一論述，希望能對雙方關係的演變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分疏。

二、利益相通，敵愾同仇

孫中山對日本的重視，最早見諸於文字者，當爲 1894 年 6 月提出的〈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書〉。在這份提倡中國改革之道的說帖裡，孫中山認爲西方文明的精髓，不在於船堅砲利，而在於人力物力資源的全面開發。也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綱領的貫徹執行。在這份說帖裡，他特別舉日本爲例證，指陳日本「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

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1]這是孫中山29歲時的作品，代表他早年的治國理念。他除了反覆強調中國的改革應捨末逐本，從根本制度與觀念入手之外，也強調日本成功經驗的意義，這正凸顯出他對日本改革的肯定，認爲日本是一個可學習的楷模，同時，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在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竟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不滿。

孫中山這種以現代化改革的成敗，判斷兩國政府施政得失之心態，在同年11月提出的〈興中會成立宣言〉裡，也有清楚的反映。他說：

>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2]

顯然，對於同年8月爆發的甲午戰爭，他的解讀是「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這足以代表他將戰爭爆發的主因，歸咎爲中國之積弱，以及朝廷的昧於情勢；對主動挑起戰火的日本，反而無意責難。他的甲午戰爭論，反映出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並未影響他對日本的好感。蕞爾小國，敢向華夏挑戰，反而被他視爲日本改革有成的標幟。

這種將日本視爲亞洲改革開放的楷模，視爲一個能告別傳統分享西方現代化經驗的事業夥伴之看法，更可從他向日本政府求援的具體行動中，反應無遺。

1895年3月1日，時值甲午戰爭末期，孫中山經友人介紹，拜訪了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川恒次郎。根據中川的報告，孫中山自稱爲興中會代表，因不滿朝政，擬在廣東起義，鑑於諸事具備，只欠軍械，望日本政府能提供長槍二萬五千枝，短槍一千枝。[3]爾後，孫中山還不時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尋求援助。

---

1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集5，頁9。

2 同上書，集4，頁55。

3 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卷2，頁392-393。

中川總領事對孫中山並無惡感，對他所分析的廣東人民對朝政不滿之情勢也深表認同。不過，因對孫中山夙無所聞，進而對興中會的領導以及組織能力頗有質疑。再則，因沒有本國政府的訓令，他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自然不便表態，只是在 3 月 4 日[4]以及 4 月 17 日，將雙方會面的情況分兩次向本國的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彙報。[5]

不過由於馬關條約已於同年 4 月 17 日簽約，孫、日雙方可憑藉相互利用之前提已喪失，至此，孫中山不再向日本政府求助，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也沒有更進一步瞭解的意圖，雙方的關係，也就不了了之。

孫中山與日本政府的再度接觸，是他在 1897 年 6 月第二次到達日本的事。孫中山原本無意久留，日本只是他從歐洲經加拿大到法屬越南的途經之地。[6]不過，他在橫濱與日本外務省諮議宮崎滔天相會，經由宮崎的勸說，他才決定留在日本發展革命。[7]關於他留在日本的經緯，孫中山在《自傳》裡有這樣的回憶：

> 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宮崎滔天）、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8]

---

4 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卷 2，頁 392-393。

5 同上書，頁 395-396。

6 根據孫中山的《自傳》，他回亞洲的目的就是要到日本。不過，根據犬養毅的傳記資料，孫中山只是途經橫濱，主要目的還是越南。鑑於當時的橫濱爲自由港，外國人可自由進出，但離開橫濱進入日本內地則需簽證。犬養毅是協助他取得日本簽證的關鍵人。因而，對當時的情況，身爲當事人犬養毅的資料，自然有其可信度。何況，孫中山在來日之前，與犬養毅夙不相識，與日本政府也沒有交往的管道，更不知日本政府有援助反清勢力的計畫，他之所以會留在日本，是一連串的因緣巧合，絕非他事先所可計畫。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1，頁 35。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原書房，1968），下卷，頁 1284。

7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下卷，頁 1284。

8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1，頁 35。

從這段回憶來看，孫中山之所以留在日本，與日本政府樂意相助中國革命有密切關係；至於日本政府之所以樂意與中國革命相善，從這段回憶的文脈觀察，似乎又與「日本民黨初握政權」有密切關係，而且犬養毅更是居於運籌帷幄的關鍵地位。因此，如果我們能以「日本民黨初握政權」爲考察線索，探討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當能更深入的理解孫中山與日本政府關係發展之始末。

彼時，中國雖失利於甲午戰役，但東洋大國的舊印象仍深植人心。[9]再則，甲午戰後，中俄愈趨接近，也使日本惶恐不安。1896 年 5 月，李鴻章訪問俄國，對西伯利亞鐵路穿過滿洲直達海參威一事，兩國達成協議。此外，國際社會也傳聞，中俄已簽定專以日本爲假想敵的軍事同盟條約。日本政府爲此實是寢食難安。在此一時代背景之下，日本除了傾其全力，動員駐外使館，追查中俄密約虛實以外，[10]扶植反清勢力，以謀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也就成爲日本政府對華外交政策之一環。[11]

負責執行此一扶植反清勢力政策者，即爲日本立憲改進黨議員犬養毅。犬養毅原本爲統計院總裁大限重信之幕僚，1881 年大限重信被罷黜離職，犬養毅也隨即辭官跟進，[12]並於 1882 年協助大限重信籌組立憲改進黨，爾後即以大限重信的左右手身分，活躍於日本政壇。[13] 1896 年 9 月，大限重信再度入閣，擔任外相，犬養遂利用其在野身分，專爲大限重信統籌日本官方不便出面之對外事務。

犬養毅對中國之事務並不熟悉，對中國革命的動態更不瞭解，只知中國南方有反清的秘密會黨存在，爲一探虛實，遂於 1897 年 7 月，派遣宮崎滔天、平山周等人赴中國作實地調查。犬養毅自身對與孫中山相識的經緯，如是回憶道：

---

9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頁 12-20。
10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卷 29，頁 937-969。
11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頁 19-21。
12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上卷，頁 171-179。
13 同上書，頁 220-221。

當時宮崎滔天以外務省諮議身分負責調查中國南方秘密會黨。但他到中國後始知會黨領袖孫文在從歐美東來，會途經日本，故其趕回橫濱，俾與孫文見面。交談之下，對孫文人品大為折服，故力勸他留在日本發展革命事業，並將孫文帶到東京。但外務省次長小村壽太郎積極反對孫文留在日本。在這種進退兩難之際，本人基於人道立場而參與援助孫文的活動。[14]

照犬養毅的說法，宮崎滔天將孫中山從橫濱接到東京及勸說孫中山留在日本之事，完全是出於宮崎滔天的個人意見。當事人宮崎在回憶錄裡也證明這件事完全出於己意，犬養毅所言不虛。[15]惟據孫中山《自傳》所言，宮崎的所作所爲是受到犬養毅的指示。[16]兩者的說法顯然不同。不過，兩種說法所以發生差異的原因，應從犬養與宮崎之間的關係進行理解。事實上，宮崎應日本外務省聘爲諮議前往中國調查秘密會黨，是出於犬養之斡旋，[17]而宮崎力勸孫中山留在日本，是使用犬養名義而爲之。[18]由此，我們可以推斷，犬養之所以援助孫中山絕不像他自己所說純粹基於人道立場，而是爲了執行日本的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孫中山之所以會留在日本，固有時代背景的因素，也是個人際遇的因緣巧合。宮崎滔天原來所奉的指示，只是對中國南方反清秘密會黨的活動狀況作實地調查，只因他「關心亞局興衰籌保黃種生存」[19]，在橫濱與孫中山相見後，就擅自主張，強留孫中山留在日本發展革命，所幸，他的

---

14 犬養毅，〈世界人の横顔(9)：ボロ洋服の孫文にも革命志士の風骨〉，《東京朝日新聞》（1930 年 7 月 21 日）。

15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收入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東京：平凡社，1971），卷 1，頁 107-120。

16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1，頁 35。

17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頁 108。

18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1，頁 176-178。

19 孫中山替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作序時，對宮崎的讚語。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6，頁 219。

臨時起意，也能得到犬養毅的支持，進而也爲中國革命添加一份助力。特別是孫中山自 1895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以後，身爲清廷通緝對象，被迫亡命海外，爲求繼續拓展革命事業，他自然將設置海外基地視爲推展革命事業的首要關鍵。他在 1897 年之所以要回到亞洲，就是渴望能在緊臨中國的越南，建立革命基地。在日本橫濱與宮崎滔天的巧遇，幫他解決了革命基地的問題以外，也讓他的革命事業因得到日本政府的奧援，而得以重新整頓，再謀出發。

爲謀制衡清廷政府的反日政策，日本政府除了扶植孫中山的反清革命運動以外，積極培養清廷內部的親日勢力，則是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另一支柱。1898 年 4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發表《勸學篇》，其中諸如「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留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20]等論述，啓動了中國朝野對留學日本的重視。

日本駐華代理公使矢野文雄隨即利用張之洞所掀起的日本留學風潮函告清廷總署稱，日本政府願意提供二百個獎學金名額給中國留學生，以支援中國推行新政培養人材之大計。[21]利用中國朝野熱衷講求變法圖強之際，積極宣揚日本可替中國培訓人材，可謂是日本政府爲牽制中俄接近的重要布局。藉由留日學生之培養，非但可以加強雙方聯繫，創造商機，樹立親日勢力，仰賴日本領導等等一連串明顯可即的利益，更可助長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劉坤一等南方總督所倡導的與日、英結盟政策的聲勢，對清廷的聯俄政策，當可謀制衡之力。

聲援康有爲的維新變法運動，則是日本政府扶植親日勢力的另一套外交布局。康有爲的維新變法，以明治維新爲仿效標的，尤以倡導與英、日結盟爲外交主軸，因而維新派自始就被日本朝野視爲親日勢力的代表，一直刻意

---

20 王樹枬編，《張文襄公全集：勸學篇．輶軒語》（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頁 14531-14533；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上冊，頁 419。

21 〈矢野文雄發外務大臣西德二郎宛の報告書〉（1898 年 5 月 14 日），收入《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陸軍學生の部》，卷 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機密第 41 號，原件。

籠絡他們。駐華公使矢野與康有爲在北京有密切的來往，[22]日本軍方在派員到中國遊說兩國軍事教育合作計畫之際，面謁活躍各地的維新派人士，也成爲行禮如儀之一部分。[23]

1897 年年初，日本朝野人士合組「東亞會」，主張重視中國問題，立會之初，便將特許康有爲、梁啓超入會列爲該會成立宗旨。[24]東亞會是東亞同文會的前身，與日本軍方夙有聯繫，[25]其對康、梁的禮遇，更反映出日本朝野對維新派的重視與期盼。

戊戌變法失敗，日本朝野積極搶救康、梁的行動，更顯示日本朝野對維新派的重視。日本政府以國賓身分，於 1898 年 10 月 24 日將康有爲從香港迎接到日本。當政變初起，梁啓超自 9 月 21 日起就躲匿在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爾後再由日本軍艦大島號專程將梁從天津接到日本。[26]

日本政府將康、梁接到日本，當然代表他們對中國變法運動的支持，也代表他們對親日勢力的扶植。不過，變法運動的失敗，也讓日本的扶植親日勢力計畫，遭遇全面的挫敗。原先與維新派同調，主張與英、日同盟政策的南方總督們，爲了與維新派劃清界線，自然避諱重提親日政策。曾大事宣揚的留學日本議題，除了關於武備學生留學日本學習軍事的計畫稍有進展之外，[27]其他學科皆未有重大突破。

當日本面臨重新調整對華政策之際，隨勢而起者，則爲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孫中山於 1897 年 9 月起，開始留在日本，他的居留身分是日本外務省

---

22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政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163。

23 同上書，頁 163-164。

24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上卷，頁 680。

25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頁 110-114。

26 彭澤周，〈關於康、梁亡命日本的檢討〉，收入《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頁 4-5、25-27。

27 淸廷自 1898 年起，先有浙江巡撫派遣四名學生，翌年繼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等地方總督巡撫相繼派遣留學生，總計七十餘人，揭開兩國軍事教育合作計畫的序幕。

諮議平山周的語文教師，[28]生活費則由犬養毅向同黨的平岡浩一郎議員處募捐而來。[29]這樣的安排，正顯示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支援，僅限於非正式層面。特別是與康、梁在日本的待遇相較，日本政府以政府名義接待康、梁，以政府經費負擔康、梁生活，[30]更清楚表明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就孫中山自 1897 年 9 月定居在日本後的行止而論：他在橫濱創設中西學校，派同志陳少白到臺北設興中會分會，並於翌年 3 月在橫濱約見興中會會長楊衢雲。[31]約見楊衢雲後，他即於同年夏天，自東京移住橫濱，「除經常與東京犬養毅往還外，多閉門讀書」[32]。廣州起義失敗以後，楊衢雲亡命南非，孫中山特地將他從南非請到日本，可見孫中山也在謀定思動，已準備重整革命事業。派陳少白到臺灣設分會，自然也是爲了替革命事業的再起預做部署。不過，「閉門讀書」成爲孫中山的生活重心，無疑的正意涵著中國革命的瓶頸一時還無法突破。

1898 年 10 月，康、梁亡命日本，此一情勢的驟變，也讓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焦點從中國本土拉回到日本國內；尤其是維新派從主政勢力一下淪爲叛國勢力，日本政府自然也不便循正式的外交管道與那些留在中國國內的維新派維持聯繫，因此重整對華的交流管道，勢所必行。東亞同文會的組成，便是例證。是年 11 月，在犬養毅等人的斡旋下，日本外務省將原來兩個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組織：「東亞會」、「同文會」合併共組爲「東亞同文會」，[33]負責統籌與中國的文化交流事務，並從外務省機密費中撥下八萬元給「東亞同文會」，使其在推動教育文化事業之餘，也能爲日本政府開闢另一非正式

28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東京：弘隆書林，1980），頁 79。

29 古島一雄，〈革命中國との因緣：一老政治家の回想(6)〉，《中央公論》（1951 年 2 月），頁 190-191。

30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政變》，頁 225。

31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上冊，頁 132-136。

32 同上書，頁 136。

33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上卷，頁 680-681。

的外交管道。[34]顯然，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利用東亞同文會來整合日本與中國的民間管道，是日本對華工作組織上的一大調整。利用革命派、維新派領導皆落難於日本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號召兩派合流，則是日本政府企圖整合親日勢力的另一大工程。

對於日本政府的整合工作，孫中山欣然接受，康有爲卻嚴峻拒絕。[35]不過，在衆多日本政要出面主持的協調會中，爲顧全大局，康有爲至少允許弟子梁啓超代爲出席。[36]所以，兩派的整合工作，雖然全功未竣，雙方的交流卻始終不斷。雙方頻繁的交流活動也造成梁啓超、唐才常等人的立場是時有動搖，[37]而位屬基層的更不乏有投入革命陣營者。

「反清」是日本政府看重孫中山的最初原因。然而，在日本政府主持的與維新派的整合工作中，孫中山積極認同日本政府的理念，則更讓他開始被視爲親日勢力。此一身分認同的轉折，使得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可與康、梁的維新派共用日本政府的資源，特別是在日本政府派出衆多幹員到中國國內，重整親日勢力之際，孫中山因爭取到維新派部分幹員的支持，而得以將原本是維新派的勢力，一一納爲革命勢力。其中，尤以興漢會的成立，對孫中山革命勢力的成長最有幫助。

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原以廣東地區爲限，此點可以從他的第一次廣州起義時的軍事部署得到旁證。他的武力基礎，來自興中會的成員、廣東地區三合會的會黨勢力以及因復員措施失當，淪爲流寇的原清廷軍隊等三股勢力；這些勢力都沒有其他省分人士的參與。[38]

1899 年 10 月在香港成立的興漢會，是興中會、三合會以及哥老會的組合，也是孫中山革命勢力跨出廣東省域的里程碑。[39]革命勢力在廣州起義失

[34] 柏原文太郎，〈東亞同文會創立時代の霞山公〉，《支那》，號 128（1934 年 2 月），頁 129。

[35]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頁 51-52。

[36]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頁 37。

[37]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頁 120-130。

[38] 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655-658。

[39]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頁 152-155。

敗以後，非僅重新整合原有的興中會、三合會的基礎勢力，並且納入了長江流域中最大的會黨，在長江沿岸各省皆有勢力的哥老會的力量，[40]正是革命再起的象徵。於今，孫中山能夠整合三合會與哥老會的結盟，並被兩會共擁爲會長，也使他一躍成爲長江流域以南秘密會黨的盟主。

然而，興漢會的組成，主要得力於日本政府的奧援以及維新派的投靠，尤其以宮崎滔天及平山周是代表日本政府全力促成興漢會成立的關鍵人物。如前所述，宮崎滔天及平山周當年曾奉日本外務省之命到中國南方考察秘密會黨，亦是勸孫中山留在日本發展者。兩人在戊戌變法之際，又奉犬養毅之命到中國調查變法內情。[41]是以，戊戌變法失敗後，兩人也適時投入救援工作。宮崎滔天從香港將康有爲接到日本，[42]平山周則在北京拯救維新派大員王照，陪伴他到塘沽登日本軍艦大島號，爾後與梁啓超同艦回日本。[43]由於兩人與革命勢力、維新派皆有密切往來，因而在日本政要出面整合雙方合作之時，兩人皆兼負聯繫、斡旋之責。

宮崎滔天及平山周兩人都將維新、革命兩派不能順利整合的原因，歸咎於康有爲的頑固與傲慢，因而自然對隨和及開通的孫中山日有好感。[44]此種心態的轉折，也使得兩人在執行日本政府扶植親日勢力的對華政策時，皆樂意以扶植孫中山勢力爲第一優先，他們對於誘導維新勢力投入革命陣營更是樂在其中。

畢永年原來是維新派的大將，後來卻是主導哥老會投向革命陣營的靈魂人物。畢永年，拔貢出身，曾與譚嗣同、唐才常等設南學會於長沙，參與《湘報》、《湘學報》的創辦。他往來於漢口、岳州、長沙間，與哥老會諸魁楊鴻鈞、李雲彪、辜鴻恩、師襄、李華棠等過從甚密，投身哥老會後亦被封爲

40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在日本：1895-1914》（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 40。

41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頁 121。

42 同上書，頁 133-136。

43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79。

44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頁 51-53。

龍頭之職。[45]他與平山周相識於戊戌變法期間，並結伴入北京支援變法。[46]當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亡命東京，受到現代文明的洗禮，思想銳變，決定獻身革命。1898 年 11 月 15 日，平山周奉甫成立的東亞同文會之命，到中國兩湖地區調查政情之際，[47]畢永年也自動請纓，和平山周隨行，爲促成兩湖的哥老會投靠革命而努力。[48]翌年 10 月興漢會的成立，正是畢永年的努力所成。[49]

興漢會在中國革命史上只是曇花一現的組織，後來即因康有爲趕回香港，重整地盤，使這些新加入革命勢力的哥老會的會黨領袖一一倒戈，興漢會也就自然消失。[50]不過，興漢會對奠立孫中山的革命領導地位，卻達成了階段性任務。

觀察孫中山早期的革命生涯，更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興漢會的歷史地位。孫中山一手首創檀香山的興中會，眾所周知。後來，孫中山決定將革命組織遷回香港，籌備廣州起義，於是決定與當時香港的另一革命組織「輔仁文社」進行合併。與「輔仁文社」合併後的新革命組織，除保留了興中會會名以外，一切皆是「輔仁文社」的延續，會員們也大都是「輔仁文社」的成員，[51]在這樣的情況下，使得新組織的「伯理璽天德」── 也就是會長一職──是由「輔仁文社」的原任社長楊衢雲出任。[52]換言之，根據興中會的組織章程，1985 年 10 月的廣州起義，楊衢雲才是負責人，孫中山還不能稱爲革命派的

---

45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48-149。

46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79。

47 〈犬養毅ト宮崎寅藏：警視廳ヨリ外務省宛ノ報告書〉（1899 年 6 月 2 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卷 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乙秘第 712 號，原件。

48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79。

49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頁 94-95。

50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85。

51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 178。

52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166-169。

領袖。

1897 年 6 月，孫中山從歐洲回來，卻意外的被日本政府視爲革命領袖，主要得力於他在英國出版的《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53]，以及他在西方社會所締造的革命領袖形象。[54]日本政府的奧援，使孫中山能以日本爲基地，重謀革命的再起。這也是他在 1898 年 3 月，商約亡命南非的楊衢雲到日本的原因。興漢會的成立，代表長江流域以南秘密會黨的整合成功，在他已成功的出任南方秘密會黨的盟主之際，他也決定要取回他在興中會的原有職務。

對楊衢雲的辭職，孫中山的接任，謝纘泰有以下的記載：

> 楊衢雲告訴我，孫逸仙博士已要求他辭去興中會會長，以便讓給孫博士。這事使我很驚奇。他說：「不久前我們幾乎分裂成兩黨，這是很危險的。有一天孫博士告訴我，揚子江各省的哥老會已經推選他為會長，並且暗示說不能有兩個會長，如果我不承認他的新職位，那我必須獨立工作。我向孫逸仙表白，我十分願意辭去我的職位，並且勸告他不要鼓勵分裂。我同時告訴他，為了我們的事業，我一向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說我的職位了。我說我們必須服從人民的意志。我也告訴他，只要在他的領導下運動能成功的進行，我是不理會誰被推為會長的。孫先生要求我問你是否贊成這個改變，是否承認推選他是會長。」（見我的日記）為了防止黨的分裂，我勸楊衢雲辭去會長一職，把它讓給孫逸仙博士。[55]

53 Sun Yat-sen, *Kidnapped in London* (Bristol: Arrowsmith, 1897).

54 孫中山之所以被日本政要認定爲革命派領袖，主要是根據宮崎滔天及平山周的調查報告。宮崎滔天在赴中國調查反清勢力之前，曾因友人曾根俊虎之介紹，專程到橫濱拜訪過陳少白。從陳少白處獲贈孫中山寫的《倫敦蒙難記》，這是他閱讀有關中國革命事務的第一本著作，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解，自然是以這本書的視野爲起點。爾後，宮崎到中國，初期的接觸對象皆仰仗陳少白介紹，這種以孫中山爲主軸的調查方式，所得出的結論當然會以孫中山馬首是瞻。

55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kong: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pp. 16-17；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頁 96。

謝纘泰出身澳州，於 1887 年抵香港，是「輔仁文社」的創始會員，也被史學家吳相湘視爲可與孫中山、楊衢雲並列爲興中會香港總部的三位主要領導者之一。[56]由於他是「輔仁文社」的原始會員，與楊較相善，因而文中難掩其不平之氣。不過，這段記載也忠實的反映出一個具體史實；在日本政府的奧援下，孫中山已成爲實至名歸的領袖，是唯一能率領興中會走出困境的革命領導。至於興漢會的成立營造出孫中山的革命領導氣勢，無疑是促成楊衢雲於 1900 年 1 月 24 日願意以理性方式辭去興中會會長一職的關鍵。[57]

三、若即若離，關係丕變

孫中山在 1900 年 1 月順利接任興中會會長後，首先得面對的課題就是如何利用新整合好的長江流域及兩廣地區的會黨勢力，伺機揭竿起義。適時義和團興起，清廷對外宣戰，北方疆野爲之糜爛的局面，正是號召民衆自救的好時機。孫中山在《自傳》裡對此一時期的活動作了以下的回憶：

> 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畫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時臺灣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畫，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黨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省城，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

56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臺北：遠東圖書出版，1982），上冊，頁 118。
57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52-153。

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者，而予潛渡之計畫，乃為破壞。[58]

根據這段回憶，我們可以得知 1900 年 10 月 8 日的惠州起義，應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前者沒有日本政府參與，以兩國民間人士為核心；後者以臺灣總督府為奧援，預計將有大批日本軍方的人力及物質支援起義行動。

如果歸納孫中山在這段時期的行程，並與上述的回憶對比，更可勾勒出當時孫中山的活動情景。1900 年 6 月 17 日，孫中山由日本抵香港，6 月 21 日由香港轉抵西貢，7 月 9 日自西貢至新加坡，再於 7 月 17 日重返香港，7 月 20 日離香港赴日本。爾後，8 月 22 日從日本東京，經神戶長崎轉赴上海，9 月 1 日離上海返日本，9 月 28 日再自神戶抵臺灣基隆，11 月 16 日自臺北抵東京。[59]這段行程，反映出兩次的香港之旅是關鍵之一，44 天的臺灣之旅，則是另一個關鍵。6 月 17 日的首次香港之旅，目的在為替惠州起義部署。其間，他也不忘透過兩廣總督李鴻章幕友劉學詢的斡旋，試圖與李鴻章合作，謀求華南獨立。在軍事部署或政治協商，都還沒有確定成果之時，孫中山又委請日本友人宮崎滔天、清藤幸七郎趕赴新加坡，代表革命黨與康有為商談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本人更是馬不停蹄的趕到越南，企圖爭取法國駐越南的殖民當局對革命的支持。[60]

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凸顯出中國在極端的失序情況下，「救亡圖存」是大家共同關心的課題，如何在捨異求同的前提下，尋求與不同的政治勢力合作，無異是此一時刻孫中山的所思所見所聞。遺憾的是，這些嘗試最後都嚐到了失敗的滋味。

首先破局的是西貢之旅。孫中山並未如預期的見到安南總督韜美(Paul Doumer)，在與他的代理人會談後，孫中山並未爭取到法國殖民當局對惠州

58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1，頁 36-37。

59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58-183。

60 同上書，頁 157-160。

起義的支持。[61]其次面臨的是宮崎滔天、清藤幸七郎在新加坡被康有爲誣告爲刺客，因而被逮入獄的消息。爲此，孫中山趕赴新加坡，與日本駐新加坡領事共同營救宮崎等人出獄。[62]與康有爲的合作，自然也因康此一反常舉動，而宣告破局。[63]

孫中山在 7 月 17 日重返香港，爲的是等待與李鴻章進行政治協商的結果。但因局勢驟變，尤其是李鴻章被重新任命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後，又決心歸順朝廷，一掃往日因對清廷對外宣戰而起的疑慮之心，使得此一謀求華南獨立計畫，因李鴻章決心北上而無疾而終。[64]可是，孫中山爲了等待在香港與李鴻章直接面談的機會，而使得行蹤曝露，在香港水警重重監視下，孫中山自不易從船上脫身，這使得原擬親自統率的惠州之義，不得不委由鄭士良代爲負責，也爲起義後新政府之各部門負責人，預做部署。孫中山擬以畢永年爲內務部長，平山周爲外務部長，原楨爲參謀長。[65]在完成規劃以後，孫中山才黯然返回日本。

8 月 22 日，孫中山自日本啓程赴上海，企圖找尋在華中地區發動起義的機會。由於在香港的日本同志原禎、福本誠等人臨時退縮，並相繼返回日本，香港的起義總部面臨瓦解的危機。爲了重整革命勢力，特別是探討與倡導東南自保運動的總督們之間合作的可能性，[66]孫中山專程趕赴上海。不料，因自立軍起義未遂，上海地區戒備甚嚴，孫中山也被列爲緝捕名單之內。爲此，孫中山雖一度於 8 月 29 日上岸，旋即接受英領事勸導，於 9 月 1 日再返日本。是以，上海之行，僅上岸兩日。[67]

---

61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 266。

6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頁 217-219。

63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頁 166-186；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60-161。

6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頁 110-111。

65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89；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62。

66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 227-238。

67 同上書，頁 235。

直至9月28日，孫中山再離日本，遠赴臺灣，爾後就以臺灣爲基地，策動惠州起義。按原本之計畫，革命軍如能直逼廈門，孫中山就可在臺灣總督府協助下，從臺灣進軍廈門，與革命軍會合。臺灣總督府並允諾將提供彈藥以及以志願軍官參戰的方式，派遣日本軍官助戰。[68]不料，當孫中山如期赴臺灣，惠州的起義行動也隨即發動，臺灣總督府先以要嚴防英國政府抗議，爾後又以內閣異動新政府不許爲由，拒絕履行前約。[69]因此，革命軍雖曾一時雲集二萬餘大軍，但終因武器補給無望，只得於奮戰十二天後解散。[70]

透過對惠州起義整體歷史現場及其脈絡的重建，我們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層面，回顧惠州起義時期孫中山與日本朝野的關係：第一，以義和團事變爲時代背景，探索日本政府的遠東政策。第二，以日本政府的遠東政策爲線索，探討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變遷。第三，以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演變爲焦點，分析孫中山與日本政府關係從親轉疏的來龍去脈，以及此一關係的演變對往後中國革命走向的影響。

在設計惠州起義的第一階段過程中，雖然沒有預期日本政府會參與，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卻得到臺灣總督府願意提供軍事援助的允諾。日本政府對惠州起義態度的不一，反映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搖擺不定。是以，欲理解惠州起義與日本的關係，自然得以理解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爲首要。

當戊戌變法失敗，日本政府意圖支援維新派，但又不願公開與清廷爲敵，因而特成立東亞同文會，由此一民間財團法人代爲統籌所有與中國的文化事務交流，特別是以維繫維新派以及伺機扶植親日勢力爲會務重心。不過，東亞同文會正式成立，正式負責推動中國事務後，卻發現夙來與日本友好的中國華中華南地區的總督們，爲了避諱被清廷誤視爲維新派，無一不主動與日本劃清界線，並要求日本政府交出或驅逐康有爲等人。[71]由於中國的華中、華南地區爲中國最富沃之區，也是商機最盛之地，若沒有該等地區總

68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172。
69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248-253。
70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172-182。
71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政變》，頁231-233。

督們的支持，東亞同文會在推動會務上是寸步難行。爲此，東亞同文會只得說服日本政府，讓康有爲離境。[72] 1899年3月22日，康有爲離日赴加拿大，[73] 不僅代表東亞同文會的勸說成功，更象徵著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新的對華政策，自然是以與華中、華南地區總督們的交流爲核心。

扶植親日勢力，原本爲東亞同文會成立之宗旨。而親日勢力，約可劃分爲維新派、革命黨以及華中華南地區的地方官僚勢力。是以，東亞同文會在推動會務之初，自然期許三派親日勢力都能日滋壯大，以便在適當時期日本政府再謀統籌整合。但不料除了革命黨願意整合以外，其餘兩派皆是互不相容，在整合無望之際，日本政府只得選擇最具實力者，這也是令康有爲離境，以湖廣總督張之洞爲核心的地方官僚勢力成爲日本政府首要合作對象之原因。

東亞同文會扶植親日勢力的政策，是一部以聯繫維新派爲起點，然後共同扶植三派，最後卻獨尊地方官僚的演變史。在這個扶植親日勢力政策的過程中，革命黨從未位居主位，不過卻在資源共享的情況下，日趨壯大。換言之，在日本政府扶植親日勢力的排序名單中，革命黨一直是敬陪末座。可是革命黨一直採取有容乃大政策，又有國際視野，對日本政府的整合親日勢力政策，一向高度配合，這些特質使得東亞同文會的事務單位反而對革命黨人特別垂青。[74]東亞同文會成員，以該會經費暗助革命黨接收維新派在長江流域之會黨勢力，已如前述。

惠州起義，並非東亞同文會的既定援助目標，不過，在扶植日本勢力的大政策目標下，東亞同文會設在中國的分部以及外圍組織，卻陸續將經費投向支援革命黨。例如玄洋社的主要幹部內田良平，爲了支援革命，曾親自一路伴隨孫中山到香港、上海等地，並以福岡、廣島、長崎爲據點，招募了三

---

72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54），卷2，頁238-239、293-294。

73 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5），上卷，頁132。

74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頁53-56。

百多位志士，以便跨海支援作戰。[75]這些大規模的支援活動的經費，就是由內田、宮崎滔天、平山周等人從東亞同文會歷次所支領的中國政情調查費四萬餘元中累積儲存而來。[76]

綜合而論，惠州起義，與日本政府無關，不過卻得力於東亞同文會，分享到日本外務省的秘密經費。鑑於在經費以及人事上，皆仰賴於這批日本友人，因而惠州起義在部署上是一個中日民間人士的聯合軍事活動。這也是爲何孫中山在任命起義軍的軍事革命領導委員會時，以日本友人原禎爲參謀總長、平山周爲外務部長之原由。也就是說，惠州起義對日本人多有仰賴，惟有委以重任，才能有助於事先的協調及事後的發展。

不料，當惠州起義從籌備期正式邁入實踐階段時，卻遭到東亞同文會的打壓。東亞同文會與革命黨關係之突變，肇因於新出爐的東亞同文會的作業方針，已不允許革命黨人有任何活動空間的存在。

爲因應 6 月 19 日清廷對外宣戰的舉動，東亞同文會於 1900 年 6 月 21 日召開了評議會，針對中國變局提出了多項決議，其中第三條決議，即爲「北京政府滅亡或喪失統治機能時，爲恢復和平，將率先在南方的合適地點協助新政府成立。若列國瓜分沿岸領土，日本也應伺機而動，出兵佔領有利於日本國家利益之地區」。[77]

把東亞同文會的這項決議，和日本政府之對應相類比，我們可以將義和團時期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歸納出以下三點：一、提倡保全中國政策；二、支援東南自保運動；三、藉機擴展日本在福建之勢力。在這三大原則下，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是藉由三個不同的管道，分頭並進。

第一個管道由日本政府主導。反對瓜分中國，支持英、美兩國倡導的「保全中國」政策。認爲中國的存在，有利於日本發展，尤其是中國可以扮演介

75　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頁 59。

76　〈福岡縣知事深野一三發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宛の報告書〉（1900 年 8 月 26 日及 28 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高秘第 848 號及 857 號，原件。

77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卷 3，頁 190。

於西方勢力與日本之間的緩衝國的角色。中國的存在，可避免日本直接面對西方勢力的入侵。[78]爲配合此一政策，日本特別應英國政府的邀請，[79]派遣二萬二千餘人的部隊加入聯合軍，在八國聯合軍事行動裡，這是參戰人數最多者。[80]

第二個管道由東亞同文會主導。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拒奉清廷對外宣戰詔，於 6 月 26 日與各國駐上海領事達成「勦拳匪、保教民、護商業、各不相犯」之協議。[81]對於諸督撫的此一舉措，日本樂觀其成。此外，日本還打算利用此一獨立狀態，策劃在華中、華南地區另設一中央政府，換言之，當「保全中國」政策不得貫徹實施，中國終將面臨列強瓜分之勢時，日本將利用東南自保運動所奠定之基礎，支持該地區的官僚勢力，成立一個親日政權。

第三個管道由臺灣總督府主導。6 月 23 日，駐廈門的領事團達成協議，請求現駐防廈門外海的日本海軍軍艦不要移防，以便拳匪之亂席捲廈門之時，日本海軍可適時登陸，保護外人安全。[82]日本政府接受了此一要求，並決定再加派軍艦高千穗號趕赴廈門。[83]山縣有朋內閣也於 8 月 10 日的內閣會議中決議，日本政府在必要情況下可出兵廈門，以便保護日本僑民。[84]

正值日本政府決議可利用拳亂伺機進佔廈門之後，爲了製造藉口，外相青木周藏特於同日電訓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要求他設法在福州或廈門製造排外事件，好讓日本師出有名。[85]是以，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特提撥 600 元給廈門的日本佛教寺廟「本願寺」的高松誓代理主持，要他喬裝縱

[78] 拙稿，〈明治後期における中國像：日本政府の中國革命運動への支援と否定〉，*QUADRANTE*（東京外國語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集刊），期 2(2000 年 3 月)，頁 134-135。
[79]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說》（東京：慶應通信，1982），頁 80-81。
[8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 388。
[81] 同上書，頁 385-386。
[82]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別冊 1 北清事變》（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6），上冊，頁 903。
[83] 同上書，頁 910。
[84] 齋藤聖二，〈廈門事件再考〉，《日本史研究》，號 305（1988 年 1 月），頁 32。
[85] 同上書，頁 33。

火，以便製造義和團勢力已入侵廈門的假象。[86]果然，廈門本願寺於 8 月 24 日凌晨，傳出有「暴徒」縱火的事件；同日，日本駐廈門外海的軍艦高千穗號即應日本駐廈門領事之請，派遣一支約 80 人的陸戰隊進駐鼓浪嶼。[87]鼓浪嶼為日本領事館所在地，與廈門隔海相望，進駐鼓浪嶼無非表達日本政府之護僑決心。不料，翌日日本政府又派遣了 330 名的陸戰隊登陸廈門當地。但是，這項軍事派遣行動沒有正當合法理由，因而引起民眾恐慌，廈門所有交易立即停止；商店關門，並出現大規模的亂民潮。[88]因此，列國駐廈門領事群起向日本抗議。[89]

然而，日本政府並無意立即罷手，臺灣的軍部也開始動員。第一批 1200 名左右的臺灣派遣軍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親自率領下，於 8 月 29 日抵達廈門外海，準備登陸。[90]就在廈門似乎已是垂手可得之際，英國軍艦 "Isis" 即於同日稍早前適時抵達廈門外海，而 60 人的英國海軍陸戰隊也於 8 月 30 日登陸廈門，表達英國政府保衛廈門之決心。[91]在面對英國的強勢捍衛，以及日本出兵的理由又過於牽強，日本政府於 29 日決定取消臺灣派遣軍的登陸計畫。[92]並於 9 月 1 日英、美兩國又各一艘軍艦抵達廈門外海之際，[93]下達從廈門撤回大部分的軍隊。[94]爾後，英日兩國政府也於 9 月 7 日達成同時從廈門撤軍的協議。[95]

因此，當時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實採兵分三路之道；將之與此時期孫中山的革命戰略相對比，就可發現雙方有互不相容之處。日本政府既然在華

---

86 齋藤聖二，〈廈門事件再考〉，頁 37。

87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別冊 1 北清事變》，上冊，頁 916。

88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E Volume25: Suppression of Boxers and Negotiations for China Settlement, August 1900-October 1900*, pp. 200-202.

89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別冊 1 北清事變》，上冊，頁 919。

90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 201；齋藤聖二，〈廈門事件再考〉，頁 43。

91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 201.

92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別冊 1 北清事變》，上冊，頁 924。

93 同上書，頁 238。

94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 201

95 齋藤聖二，〈廈門事件再考〉，頁 52-53。

中、華南地區力挺地方總督，當然不願意孫中山的革命舉動，危害到這些地區總督聯盟的安定。這種對東南自保運動全力呵護的態度，也可從東亞同文會開始刻意疏離維新派，並與自立軍劃清界線的作法上得到旁證。[96]

爲了阻止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東亞同文會的幹事會特於 1900 年 7 月 14 日決議廢止該會在廣東的分部，[97]以便切斷革命黨人利用東亞同文會在廣州會址做爲聯絡據點。8 月 17 日，東亞同文會又命令南京同文書院長根津一歸國，任田鍋安之助爲代理院長，交代其主要任務爲嚴格禁止學生參與中國革命事務。[98]

革命黨原本是在東亞同文會的扶植之下，才得以日趨壯大，尤其是惠州起義的籌措，無論是人員或是經費，皆仰仗東亞同文會甚多。如今，東亞同文會公然反對革命黨的舉事計畫，當然會令孫中山周遭的東亞同文會會員舉棋不定。8 月初旬，原本任命爲惠州起義軍參謀長的原禎以及在香港負責調度的福本誠，皆相繼擅自脫離革命陣營，返回日本，無非是東亞同文會與革命黨決裂後的後遺症。[99]

日本友人相繼退出革命，自然影響了革命黨人的原本部署，這也是孫中山於同年 8 月，不得不趕赴上海，期盼另起爐灶的原因所在。上海之旅無功而返，惠州之役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就在一籌莫展之際，突然傳回臺灣總督有意與革命黨人合作之消息。

根據與孫中山同行赴臺灣的平山周的回憶，孫中山係經由立憲改進黨衆議員平岡浩太郎之斡旋，從而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取

---

96 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爲了撇清與自立軍的關係，不僅反對同文會出面向湖廣總督張之洞替被捕入獄的唐才常求情，連對日本政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所發動的電請清廷將唐從輕發落之聯署活動也拒絕參加。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卷 3，頁 283、286。

97 同上書，頁 238。

98 同上書，頁 273。

99 在惠州起義罹難的山田良政，是另一例證。他本是南京同文書院的幹事，爲了支援革命，而不得不辭去教職。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93。

得聯繫，得到他們願爲革命軍奧援之首肯後，[100]孫中山即於 9 月 28 日趕抵臺灣。[101]雙方合作條件如下：革命軍在惠州起義後，將大軍揮向廈門，屆時革命軍可盡取臺灣銀行在廈門分行之存款，[102]日軍也會伺機登陸，雙方於廈門會師之際，臺灣總督府將如約提供武器彈藥以及自願軍。[103]

不過，如果將雙方的合作與 8 月底的臺灣總督府廈門出兵事件合而觀之，應更能掌握其全貌。換言之，臺灣總督府認爲上次的出兵失敗，在於廈門治安秩序良好，日本政府出兵理由太過牽強，無法向其他列強交待。因而想藉孫中山之力，讓福建沿岸徹底成爲無政府狀態。等到廈門成爲風聲鶴唳之地後，日本政府再以保境安民的身分出兵，自然也不會落人口實。

然而，意外的，俄國突然於此時開始揮軍進佔中國東北，8 月 30 日入齊齊哈爾省城，9 月 21 日入吉林省城，10 月 2 日繼佔瀋陽。對日本而言，中國東北盡入俄軍之手引起的東亞變局，當然是朝鮮半島防務告急，日本國防有唇亡齒寒之慮。當圍堵俄國勢力繼續向南擴展，成爲日本國防的首要目標之後，爭取英、美的友誼，自然也成爲防俄政策之重要一環。在軍事以抗俄爲優先前提的遠東政策之下，日本爲了避免觸犯英、美，因而也放棄再侵佔廈門之計畫。影響所及，自然也連帶的放棄與中國革命黨人之約定。[104]

由於日本政府國防戰略及外交政策的調整，在時間上恰與內閣的異動有重疊之處，[105]也導致革命黨人的認知上，皆視內閣的異動，爲導致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突變的主因，而沒有深究東北淪亡與日本政府對外政策態度前後不一的互動關係。

---

100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94；吉野作造、加藤繁，《支那革命史》（東京：內外出版株式會社，1922），頁 69。

101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72。

10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 248。

103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頁 94。

104 信夫清三郎，〈廈門事件と惠州起義〉，《政治經濟史學》，號 167（1980 年 4 月），頁 7。

105 孫中山是 9 月 28 日抵臺灣，伊滕博文是 10 月 19 日組閣，而革命軍是 10 月 6 日舉義於惠州。

四、吳越同舟，愈趨疏離

惠州起義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活動又再度陷入低潮。一連串核心同志先後凋零，如史堅如因謀炸兩廣總督德壽，被捕就義。原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在香港遇刺，惠州起軍的總指揮官鄭士良猝死；[106]此外，自孫中山 1897 年到日本以來，一直長相左右的日本同志也皆各奔東西，另謀生路。在人事及經費皆有所欠缺的情況下，革命活動自然乏善可陳。

爲謀革命再起，孫中山於 1902 年 12 月赴越南發展。在越南逗留 8 個月後，他又經日本到檀香山、美國、歐洲訪問，一直到 1905 年 7 月才重回日本籌組同盟會。[107]這段時期，他之所以不再以日本爲革命基地，實因日本政府已不再支持中國革命運動，而往日充當日本政府與革命黨之間連繫管道的「東亞同文會」，此刻也拒絕與孫中山來往。昔日來往的日本政要，如今更只剩衆議員犬養毅一人。[108]

「同盟會」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歷史意義，毋庸多言。但是，「同盟會」之所以會在東京組成，讓中國革命運動又和日本發生密切之連繫，這種貌似偶然卻又具必然性之發展，箇中原由，當然應該從日本的對華政策進行理解。

日本的大陸經營政策始於日俄戰後。在日俄戰前，日本的國防重心是爭奪朝鮮半島的主導權；日俄戰後，日本除逼使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優越地位外，並轉讓在旅順、大連的租借地和長春至旅順的鐵路控制權以及割讓南庫頁島。這些新領域的攫奪，讓日本可全面控制朝鮮半島，切斷從東亞大陸沿朝鮮半島向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以外，並同時取得向中國大陸擴展勢力的橋頭堡。東亞勢力的重整，也促使日本的國防政策從傳統的固守海疆領域爲主

106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上冊，頁 178-189。

107 同上書，頁 199-218。

108 1902 年 12 月，孫中山有 8 個月之久的越南河內之旅。這次旅費，就是犬養毅爲其籌措所得。由此可一窺犬養毅對孫中山之熱誠。此外，宮崎滔天也向宋教仁表示說：「現今各國無一不垂涎於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治家中始終爲支那者，惟犬養毅氏一人而已。」梅溪昇，〈孫文に関する數點の犬養毅陸實宛書翰について〉，《日華日報》（1975 年 3 月），頁 2-4。宋教仁，〈我之歷史〉，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宋教仁文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上冊，頁 56。

旨的「守勢國防」，改採向外擴張領域的「攻勢國防」。[109] 1907 年 4 月，日本政府頒定「帝國國防方針」，第一項就明確宣示，日本國防的最高目標是在中國東北以及朝鮮半島上維持持續性的政策。第二項則明訂日本今後作戰的領域應以朝鮮半島及中國東北爲界，以不波及日本本島爲原則。[110]

既然日本將國防最高目標定位在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採持續性擴張政策，自然地，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此一變化，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一是指對中國的領土政策，另一是指對清廷的政策。在對中國領土政策上，日本政府放棄義和團時期所堅持的中國保全政策。也就是說，日俄之戰證明了日本已有與列強一較長短的實力，尤其是日本既然已取得可向中國東北繼續擴張勢力的根據地，當然不必再自我約束，劃地爲牢。換言之，甲午戰後，日本政府曾爲了制衡清廷的反日政策，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爾後，爲了牽制清廷的聯俄政策，而支持維新派。義和團時期，又企圖利用東南自保運動，扶植倡導獨立的地方總督另成立一個親日政權。這些一連串政策的出爐，雖然都各有訴求，但基本政策的核心，還是圍繞在日本政府對清廷的防備及敵視態度。可是，辛丑條約已讓中國從「睡獅」沉淪爲「死獅」，而日俄戰爭，又讓日本從「東瀛小國」提升爲「東亞巨人」。這種我升彼降的國勢發展下，衰弱疲態的清廷自然不需再勞日本政府防備，反而是軟弱無能的清廷，才能讓日本有可趁之機，可伺機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成果。[111]

維持清廷統治因此已成爲日本新的對華政策軸心，這種轉變，這份善意，清廷也深有體會。以「日本爲師」的中國現代化工程，無疑的就是在中日兩國關係急速解凍下的成果。特別是 1905 年清廷廢除了科舉制度，留學成爲新的取宦之途。再者，1898 年張之洞所發表的《勸學篇》又再度成爲朝野關注的焦點，在「路近費省，文字易曉，西書多已刪繁存要。中、日情

---

109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頁 10-12。
110 同上書，頁 12-13。
111 拙稿，〈明治後期における中國像：日本政府の中國革命への支援と否定〉，頁 135-136。

勢風俗相似，不難仿行」[112]等理由的考量下，繼武備學生派往日本學習軍事以外，[113]也決定派遣文法科學生赴日學習現代化。

雙方教育合作的計畫進展迅速且規劃周密。1901 年只有 274 名留日學生，到了 1905 年，僅一年間就有八千位中國青年學子群湧到日本。翌年，又有一萬二千位年輕學人去日本。再隔年，又再增添一萬名留日學生。[114]三年間，三萬餘名留學生群聚東瀛，不僅反映出中國舉國上下的救國改革之心切，同時也證明兩國教育合作計畫的成功。

然而，原本是爲朝廷舉才而大力推動的留學政策，卻在實踐的過程中漸露破綻。這三萬餘名留學生，大部分皆是各地督撫所派，本質上都是官費留學生。在赴日之前，他們並沒有明顯的政治立場；而且，在思想及政治立場上，因爲他們都被視爲忠於朝廷，故始能雀屏中選。不料，這些原被視爲國家棟樑，可望於宦途上大展前程的青年才俊，到日本留學後，受到現代文明的洗禮，目睹先進國家的進步，痛感祖國的落後，紛紛轉身革命。[115]

從參與成員的素質、革命的戰略以及其社會階層、地域代表性等面向觀之，1905 年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可謂是中國近代史上深具現代化意義的革命政黨。[116]尤其，中國同盟會是以留日學生爲核心，東瀛的留學熱潮，與清廷政府的積極鼓勵本就有因果關係。而此一被視爲國家現代化政策一環下的留學生政策，當然是全國性的。是以，中國的革命活動，也因留學生的參與，而得以突破原有的地域性瓶頸，成爲一個具有全國代表性意義的革命運動。[117]留日學生大都出身士紳，原本就是社會中堅，在以士農工商爲排名

11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 419。

113 清廷自 1898 年起就開始派遣武備學生赴日本學習，一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後，才停止這項軍事教育合作計畫。這段期間，清廷大約派遣了千名左右的學生赴日本學習軍事，其中正式完成「陸軍士官學校」學業者有 553 名。拙稿，〈蔣中正先生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近代中國》，期 147（2002 年 2 月），頁 30-34。

114 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57。

115 吉野作造，《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頁 18-20。

116 中村哲夫，《同盟の時代：中國同盟會の成立過程の研究》（東京：人文書院，1992），頁 7。

117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頁 237。

順序的傳統中國社會裡，有其一定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特別是在說服及動員群眾運動上，較下層社會的秘密會黨當然有更多的資源及公信力，這些因素，無疑的，皆成爲中國革命能有所成的重要關鍵。

留日學生圈中的革命風潮猛漲，清廷當然不會毫無所聞。爲了遏止留日學生參與革命，清廷便請求日本政府代爲管束。扶植清廷既是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基調，清廷的這項要求，日方自然是樂於協助。於是日本文部省於1905年11月2日公布了「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15條。這份以監視及管理學生活動爲主軸的規則，是針對革命黨人而來，因而也遭受到革命黨人有組織性的對抗，二千餘人的留日學生集體休學返國。留學生反擊之烈，爲日本政府始料未及，因此，日本政府遂於翌年一月取消此一管制規程。[118]

遏止留學生加入革命組織之嘗試失敗以後，爲求釜底抽薪，清廷外務部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親函日本駐韓國統監伊藤博文，請求他協助，促使日本政府同意將孫中山驅逐出境。對奕劻的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表示配合。是以取消了自1897年以來將近十年間對孫中山的政治庇護，於是孫中山於1907年3月4日黯然離開日本。[119]清廷之所以執意要孫中山離開日本，無非是因清廷視孫中山是主導留日學生走向革命的罪魁禍首。

不料即使孫中山離開日本，留日學生的革命態度也未曾有所動搖。爲了繼續打壓革命黨人在日本的氣勢，清廷外務部遂於1907年9月4日，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同盟會的會刊《民報》在日本發行。[120]禁止雜誌發行是內政問題，日本政府本無意滿足清廷的要求。後來，因清廷出使美國的使臣唐紹儀又再度提出同樣的請求，日本政府即決心干涉。日本政府這種因人而異的回應方式，無非是反映日本政府視中國爲禁臠，不願中國與其他國家過於接近的基本心態。

118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100-112。
119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66），頁46-48。
120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頁109。

唐紹儀早年留學美國，[121]夙與美國相善。當美國決定爲支持中國教育事業而歸還庚子賠款，他即以奉天巡撫之現職，專程赴美答謝。由於美國一直有意在中國東北投資鐵路，唐紹儀的赴美，自然有衆多可連想的空間。爲了牽制中美接近，日本政府決意向清廷示好。[122]遂於 1908 年 10 月以《民報》所刊載的〈革命之心理〉一文有鼓勵暗殺破壞治安之嫌疑爲理由，而於翌月將《民報》封禁。[123]由於《民報》的停刊，以及革命領袖無法在日本繼續領導革命，東京同盟會本部就在日本政府一連串的打壓下徹底瓦解。

此外，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也透過對中國的調查研究的結果，開始有所轉變。1910 年 8 月及 1911 年 6 月，日本外務省對中國的在野勢力作了兩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前者由日本駐香港領事負責；[124]後者由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主導。[125]前後兩次的中國在野勢力評估報告中，皆認爲中國在短期之內，不可能爆發革命。此外，還認定在領導人才的素質，海內外群衆勢力，國際輿論的反映以及與清廷合作改革的可能性等多種指標考核上，康有爲領導的立憲派皆優於革命黨。既然革命黨勢力不如立憲派，而立憲派又只追求立憲改革並不否定皇權，這正與日本企圖維持清廷統治的原本既定政策一致，全力支援立憲派，也就成爲日本政府的對華新政策。

1911 年 6 月 11 日，康有爲再度赴日，就是此一新政策下的具體成果。[126] 1899 年 3 月 22 日，康有爲被日本政府要求自動出境，13 年後，康有爲捲土

121 唐紹儀於 1874 年 9 月 19 日，以幼童留學身分，被清廷派遣至美國留學，曾先後就讀於哈特福公立中學及哥倫比亞大學。

122 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頁 110；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頁 512-513。

123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頁 505-529。

124 〈在香港總領事代理船津辰一郎発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壽太郎宛の報告書：香港ニ於テ觀察セル清國革命党〉（1910 年 8 月 22 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4，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機密第 42 號，原件。

125 〈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清國ニ於ケル秘密結社〉（1911 年 6 月），同上書，卷 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原件。

126 〈兵庫縣知事服部一三発外務大臣侯爵小村壽太郎宛の報告書：清國革命党首領渡來ノ件〉（1911 年 6 月 12 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兵発密第 373 號，原件。

重來，卻被日本政府盛邀入境，自然代表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重新調整。根據日本政府的情報，康有為可望於清廷在頒布憲法之同時獲得特赦。[127]企圖在康回國之前，與他改善關係，是日本政府力邀康來日本定居的原因之一；此外，希望能力助康早日回國，也是日本政府極欲與康共商大計的理由。如按清廷宣示，憲法預定於 1913 年才會公布實施。為求康能更早日回國執政，明治政府的元老大臣大隈重信，就在迎接康來日本定居之同時，也命令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為康的特赦在北京奔走。[128]是以康的遷居日本，不僅象徵著他與日本政府關係的改善，也意味著雙方已企圖建構一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既然支持康有為回國執政，成為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新指標，此一決策的過程無疑的也意味著對革命黨未來前途的否定。

日本對革命黨的否定以及無意更改封殺革命黨的態度，更可從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政府對孫中山欲借道訪日一事所持的否定態度上，再度得到證實。

眾所周知，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義時，孫中山身在美國。他在得知革命爆發後，自認他能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129]不過，他首先活動的對象，並不是如他在晚年《孫文學說》中所提的英國，[130]反倒是他刻意略而不提的日本。10 月 25 日，前日本內務大臣板垣退助，就應孫中山的請託，拜訪了現任的內務大臣原敬，希望日本政府取消不讓孫中山入境的禁令。[131]板垣的說項，原敬沒有首肯。不過，他提供了一個折衷方案。如果孫中山願意易名秘密來訪，日本政府可以默許。[132]孫中山對日本政

[127] 〈政務局第一課：康有為ニ関スル件（1911 年 6 月 20 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 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兵発密第 1471 號，原件。

[128] 同上。

[129] 孫文，《孫文學說》，收入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集 2，頁 96。

[130] 同上。

[131] 1907 年年初，日本政府因清廷外務部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的要求，於同年 3 月 4 日商請孫中山自動出境，自此孫中山就不得再自由入境日本。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頁 47-48。

[132]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東京：乾元社，1951），卷 4，頁 377。

府的此一要求，非常不滿。他認爲，訪日之本意，無非就是爲了彰顯日本政府支援中國革命之盛意，並可藉此一掃日本政府暗中庇護清廷政府之嫌。因此孫中山堅持，要訪日，就得公開。[133]對孫中山的堅持，日本政府無意讓步。於是孫中山只好取消訪日的構想。

在孫中山從事中國革命活動的歷程裡，先後被香港、新加坡、越南等殖民地當局禁止入境，吃過無數的閉門羹。可是，辛亥革命爆發後，英國政府首先同意對孫中山解除禁止入境的限制。[134]這也是 1911 年 12 月孫中山由歐洲返國時，可順利借道新加坡及香港的緣由。與英國政府相較，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封殺中國革命運動的堅持；從辛亥革命初期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可證明日方對中國革命所持的否定態度。

辛亥革命爆發後的第三天，即 10 月 13 日，日本召開內閣會議，陸軍大臣石本新六就提出這樣的質詢案：「在清朝面臨如此巨變之際，我國應如何應變？究竟要安於現狀？還是應考慮出兵先佔領某些要塞之地？如果考慮出兵，究竟是先佔領何地較爲妥當？」[135]此外，在同一天日本陸軍的軍務局長田中義一，也正式向海軍傳達陸軍對出兵中國的初步構思。[136]凡此可見，日本軍方的確有趁機出兵中國的企圖。在軍方一再鼓動出兵的同時，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也一再向日本外務省要求出兵，[137]但由於受到英國反對日本單獨出兵的牽制，[138]出兵動議即告胎死腹中。

面對革命，日本政府初步的決議則是「誘導清廷政府改採立憲君主制，

---

133 〈在紐育水野總領事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1 年 10 月 26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東京：日本国際連合協会，1961），頁 143。

134 孫文，《孫文學說》，頁 97。

135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頁 368-369。

136 〈陸軍省軍務局長ノ特使田村大尉持參：清国ニ対スル用兵ニ就テ〉（1911 年 10 月 23 日），收入《清国事変書類》，卷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原件。

137 〈內田外務大臣宛在清国伊集院公使電報〉（1911 年 10 月 27 日及 28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51-53。

138 〈在清国伊集院公使宛內田外務大臣電報〉（1911 年 11 月 2 日）；〈內田外務大臣宛在英国山座臨時代理大使電報〉（1911 年 12 月 2 日）， 同上書，頁 56-58、388-389。

並在此一大前提下，傾全力以擴大日本在華權益為要事」。[139]在日本政府政策傾向於維持現狀的情況下，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於 10 月 16 日向駐清公使伊集院彥吉發出以下電報：「帝國政府鑑於清朝政府急需彈藥以便討伐革命黨軍，決定藉由日本國商人之非正式管道玉成其事」；[140]同時也命令駐華公使，應趁機要求清廷一改往日的非友好態度，尊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既有權利與地位。爾後，10 月 23 日，清廷與日本政府之間，即根據這樣的協議精神，達成第一批武器買賣。由日本的泰平組合代理商大倉洋行賣給清廷陸軍部一批價值二百七十萬日圓的武器。[141]

是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的初期對華政策，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一）反對中國革命，（二）誘導清廷政府實施憲政改革，（三）藉機大肆擴展日本在華權益。

循此三大原則，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亦即藉由三個不同的管道，分頭並進。第一個管道由日本外務省主控。日本在外交上對革命政權採全面圍堵政策，不僅拒絕承認革命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在北京外交使節團中，以「英日同盟」為基軸，全力唆使外交使節團仍認定清廷為正統。[142]第二個管道由內務省主導。以不破壞日本政府與革命黨人的情感為由，默許日本商社秘密提供武器給革命黨人，同時也默認日本在南方各領事館所附的常設武官協助革命黨軍的起義活動。[143]第三個管道則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統籌，由參謀本部提供資金、武器支援滿洲及內蒙古的獨立運動。[144]

日本採取兵分三路的策略，希望藉中國革命變動之良機，替日本謀最大

---

139 〈閣議決定〉（1911 年 10 月 24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50-51。

140 〈在清国伊集院公使宛內田外務大臣電報〉（1911 年 10 月 16 日），同上書，頁 135-136。

141 〈泰平組合代理店北京大倉洋行ト大清國陸軍部間ノ兵器賣込契約〉（1911 年 10 月 23 日），同上書，頁 138-140。

142 〈在清国伊集院公使宛內田外務大臣電報〉（1911 年 11 月 28 日），〈在英国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內田外務大臣電報〉（1911 年 11 月 28 日），同上書，頁 382-385。

143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卷 4，頁 374。

144 兪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頁 178-180。

之利益，但是無論內外，此一政策皆不獲好評。尤其是原來企圖藉由誘導滿清皇室實施憲政改革以便控制清廷的想法，因袁世凱勢力的迅速崛起，頓成泡影。1911 年 11 月 1 日，袁世凱被任命爲總理大臣。自此，清廷的內外大權就由袁世凱接管，日本政府便失去了活動目標。再則，日本原來想以強勢支援清朝皇室，甚至以武力來維持中國君主政體，以求示好於清廷，進而圖謀提升日本在中國的發言地位等企圖，則因袁世凱另有打算，也因中國民心思變，不僅不能見容於北方官僚界，也不能得到中國全國民衆的諒解。日本在外交上的強勢作風，反而使日本在北京外交圈愈趨孤立。

爲了挽救外交上的劣勢，日本內部要求重訂對華政策之呼籲，開始不斷地出現。例如，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就一再要求日本必須出兵，認爲日本不出兵就不能逼使袁世凱就範，而且日本的一再恫嚇不僅不能奏效，也只會遭受被中國民衆恥笑的命運。[145]如果說，伊集院彥吉的出兵政策代表了官僚系統的外圍要求，那麼，日本政界元老山縣有朋[146]籌劃的「元老會議」，則代表官僚系統的內部壓力。山縣有朋鑑於主政的西園寺內閣不能有效的主控中國情勢，打算親自出馬。他以中國如果實施共和政治將會影響日本皇權政治的安定爲由，出面召開「元老會議」，企謀藉由元老會議來主控內閣，進而重訂對華政策。在他積極推動召開元老會議之同時，也企圖運用自己的威望，來替他的中國保皇政策暖身。

首先，山縣有朋於 12 月中旬指示外務大臣內田康哉，於會見即將赴華支援中國革命的日本在野黨領袖犬養毅時，務必傳達他個人不惜以出兵干涉中國內政，以維護中國君主政治的決心；同時也要求犬養毅勸誘革命黨人放棄實施共和政治的理想，以君主立憲的方式與清廷共謀妥協。[147]此外，他也同時透過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右翼分子內田良平，致電正在革命陣營裡襄助

[145] 〈內田外務大臣宛在清国伊集院公使電報〉（1911 年 11 月 19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380-382。

[146] 山縣有朋是日本現代陸軍的創建者，並曾組閣兩次，因此對日本政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147] 犬養毅，〈搖籃時代のわが対支方針〉，《大阪朝日新聞》（1928 年 7 月 23 日），收入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中卷，頁 716-717。

宋教仁處理政務的北一輝，要求把以上的要旨轉述給宋教仁。[148]

凡此可見，在日本政府內部裡，一直有一股強大的勢力欲求出兵干涉中國革命，以便維持清廷皇室。不過，1911 年 10 月 15 日、12 月 2 日、12 月 18 日的三度出兵計畫，[149]每次都受到英國政府的抗議，終告胎死腹中。爲此，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對中國的革命採默認的態度。

12 月 24 日，山縣有朋一手籌劃召開的元老會議，並不如預期有重大突破性的改變。會中仍只是重申日本將以英日協商爲基軸，企盼中國能以君主立憲的方式達成南北和議。[150]換言之，元老會議並沒有改變內閣原訂的對華政策，尤其是山縣有朋在得知英國絕不容許日本插手干涉中國革命之後，也不再堅持出兵之議。[151]因此，12 月下旬以後，日本的正式對外管道，雖然還是一再重彈支持君主立憲的老調，事實上，日本的外交重心已擺在南方。乘南京臨時政府急需外援之際，以「貸款」爲餌，誘使南京政府出賣利權，已成爲日本政府最新對華政策的重心。

漢冶萍公司的中日共有化，以招商局的航運、蘇杭甬的鐵路舖設權爲抵押的貸款談判，皆是此時期日本對華政策重心的反映。[152]換言之，十二月下旬以後，日本政府事實上已放棄繼續在中國維持帝制的想法。同時，日本政府也接受了袁世凱不受日本擺布的事實。既然在北京的戰場不斷遭逢挫折，日本政府便決定把主力放在南方，在傳統上隸屬於英國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如何藉由對華南的基礎工業及交通幹道的控制來建構日本勢力進駐華南的橋頭堡，已成爲此一階段日本對華政策的新重點。另一方面，原本已暗中籌劃的滿洲內蒙古獨立計畫，現更加緊進行。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在棄守北

148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收入北輝次郎編，《北一輝著作集：II》（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頁 63-64。

149 梁敬錞，〈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收入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輯 3 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20-21。

150 〈在清国伊集院公使宛內田外務大臣電報〉（1911 年 12 月 24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454-455。

151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頁 93。

152 臼井勝美，〈辛亥革命：日本の対応〉，頁 21-22。

京以後，希望藉由在華南及東北地區的擴張來取得補償。

革命黨人對日本政府願意懸崖勒馬，放棄出兵干涉中國革命之事是持肯定態度的，對日本政府同意以「貸款」的方式幫助革命黨解決財政困難，更表歡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與日本進行了以下三項借貸交涉：第一項，以滬杭甬鐵路的財產和營運權爲擔保的三百萬日元借貸。[153]第二項，以航行內河流域的招商局爲擔保，借貸一千萬日元的交涉。[154]第三項則是漢冶萍公司的中日合辦貸款。漢冶萍公司原先已向日本借款一千萬，此次交涉欲向日本三井物產公司再借五百萬，並認定這前後總共一千五百萬的貸款，可充數爲日本股東認購漢冶萍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金。[155]這些計畫，皆已與南京臨時政府完成簽約談判，有些甚至已發放款項，但因中國局勢多變以及英國的強烈反對，最終皆不得不以中途擱置的方式收場。英國的反對，是因爲長江流域是其勢力範圍，不可讓日本隨意侵入，日本再怎麼垂涎長江流域的商業利益，也不敢任意冒犯英國。

如前所述，自 1911 年 12 月 24 日以後，日本的對華政策重心即從北京轉爲華南及東北。此一政策反映在東北地區，就是滿洲及內蒙古的獨立運動。尤其是在此之前，外蒙古在俄國的援助下已在 11 月 20 日宣布獨立，成立外蒙古國。既然外蒙古已落入蘇俄手中，日本更不願落人之後，於是日本的參謀本部唆使「支那浪人」川島浪速組織日本義勇軍，並以這一批表面上

153 此項借貸於 1912 年 1 月 27 日正式簽定。負責借貸的江蘇省鐵路公司並在與日本大倉洋行及橫濱正金等五家銀行團簽定契約的同時，也與南京臨時政府訂立契約，將其中的二百五十萬日元提供給政府，以便政府可支付先前由大倉組訂購的武器彈藥款。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頁 139-140。

154 此一交涉表面上是招商局與日本郵船公司、日清汽船公司之間的商業談判，事實上，這是一個政府級層次的談判。貸款金額是由日本政府提供，而急待利用此貸款的則是南京臨時政府。雙方於 1912 年 2 月 6 日簽定合約，但因爲英國政府及股東的反對，合約並未履行。同上書，頁 140-141。

155 1912 年 1 月 29 日，中日雙方代表在日本完成談判簽約手續後，三井物產公司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隨即於 2 月 12 日，預付頭期款二百萬日元給南京臨時政府的孫中山大總統。但是，此一契約，因孫中山的去職及臨時政府內部的反對，爾後藉由股東總會否決的方式，中途擱置。洪聖斐，《孫文與三井財閥》（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8），頁 93-106。

以民間人士爲主，事實上卻有不少現役軍人參與的義勇軍，企圖與滿清皇室的肅親王善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蒙古王公喀喇沁王等人合組聯合陣線，在東北及內蒙古地區另建新的王國。[156] 1912 年 2 月 2 日，肅親王就在此一計畫的號召下秘密從北京脫逃，並於 2 月 6 日公開在旅順露面。由於肅親王之所以能夠從北京順利出走，全靠日本參謀本部居中統籌，是以肅親王一在旅順公開露面，滿洲即將獨立之流言，旋即廣布中外。

稍早之前，山縣有朋就已在 1 月 14 日，親撰「對清政略概要」分贈各政要，爲滿洲獨立政策暖身。在這一份說帖中，山縣有朋呼籲日本應立即派兵進駐中國東北，以便協助滿清皇室遷都。換言之，他主張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157]對他的出兵主張，日本政府沒有採納，不過在兩天後的內閣會議中卻達成決定，要與俄國共同研商兩國在內蒙古的勢力範圍之劃分問題。[158]也就是說，日後於 1912 年 7 月 8 日所簽定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將內蒙古分爲東西兩部，俄國承認東部內蒙古爲日本利益範圍，日本承認西部內蒙古爲俄國利益範圍，[159]此一協定的內涵，在辛亥革命後期就已有初步共識。

滿洲是否能獨立，關鍵在於日本能否有效支援。肅親王所以能從北京出走到旅順，山縣有朋之所以公開呼籲派兵進駐中國東北，無非表示在日本政府內部中，確實存在著一股支持滿洲獨立的力量。不過，19 世紀以來，日本在東亞社會的崛起，仰賴英國的奧援，在處理有關中國的事務上，日本尙不敢逾越「英日同盟」的既有框架。尤其是肅親王公開在旅順露面後的第十天，英國政府就正式警告日本政府不可支持滿洲獨立運動，認爲清廷既與袁世凱達成協議，由袁組織政府繼承清廷領土及主權，日本政府就不應擁戴肅親王等人另立朝廷，分裂中國。[160]有見於英國政府的反對態度，日本政府當

---

156 河原宏・藤井昇三，《日中關係史の基礎知識》（東京：有斐閣，1974），頁 135。

157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頁 93。

158 〈閣議決定：南北滿洲分界線延長及內蒙古ニ付本野大使ヲシテ交涉開始セシムヘキ件〉（1912 年 1 月 16 日），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286-288。

159 黃正銘，《中國外交史》（臺北：正中書局，1959），頁 236。

160 〈在本邦英国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2 年 2 月 16 日），收入外務省編，

然不敢再公然支持獨立運動，派兵之舉自然取消，肅親王雖然已到旅順，但被限制活動，形同軟禁。[161]而原有的義勇軍，因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繼續支援，再加以原擬行動的大批武器彈藥又被中國東北當局截獲，[162]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始終不曾出現，整個獨立運動就在零星戰鬥下結束。

是以從整體的演變局勢觀之，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間，有多次外交出擊，卻都受制於英國，終而一無所獲。日本政府以維持清廷為首要的保皇外交政策，也使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期，和日本政府毫無交涉之餘地。一直要到日本政府開始接受清廷覆亡已成既定事實，將政策重心從北京轉為華南及東北地區之後，孫中山與日本政府才有接觸的機會。企圖利用革命政權入不敷出，財政面臨崩潰危機之時，以「貸款」為餌，換取對長江流域內的礦產、鐵路、內河航行等產業的控制權，是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後期利權外交的新內涵，也是孫中山得以和日本政府重開交涉管道的新契機。但是，這段交涉，因日本政府過於功利，企圖一手顛覆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商業霸權，當然遭受英國強烈的抵制，使得貸款交涉，最終皆不得不以中途擱置的方式收場。孫中山也因得不到日本政府的奧援，在無法有效解決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困境下，只得選擇和袁世凱妥協一途。[163]

五、結論

孫中山欲推動革命，需要基地，需要財源，也需借重國際化的現代化經

《日本外交文書：清国事変（辛亥革命）》，頁 338-340。

161 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滿蒙独立運動と小池外務省政務局長の辭職〉，收入栗原健，《對滿蒙政策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頁 142-144。

162 同上書，頁 144。

163 1912 年 2 月 3 日，孫中山與三井物產公司駐上海辦事員森恪會談時，曾表示如在 2 月 17 日（舊曆年年關）以前，能得到日本的援助，則將停止南北和議揮軍北上。此外，胡漢民的回憶錄也指出，孫中山始終不願妥協，而南京臨時政府還就南北和議，主要癥結是無法解決財政危機，軍隊方面也有因欠餉而有譁潰之慮。藤井昇三，〈孫文と「滿州問題」〉，《關東學院大學文學部》，號 52（1987 年度紀要），頁 44-46。胡漢民，〈胡漢民自傳〉，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輯 3，頁 432-433。

驗，這些都是他樂於接受日本援助的理由。也因日本政府的支持，孫得以收編中國南方的各秘密會黨，奠定了他成為秘密會黨代表的領袖地位。所以，從孫中山的角度言，中國革命能夠成長與茁壯，日本確有實質的貢獻。對日本而言，甲午戰後，東洋大國的舊中國形象，仍舊深植人心。再則，1896年當中俄兩國已締結軍事同盟條約之傳聞，在國際社會廣被渲染之際，更使日本惶恐不安。為了預防清廷政府的報復，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以便牽制清廷，便成為日本政府的國策。

正因為雙方關係之接合，是基於各自利益的考量。因而，客觀情勢的變遷，即影響雙方關係的發展。1900 年的義和團之亂，是雙方關係面臨調整的第一步。1905 年的日俄戰爭，是第二步。

義和團之亂使日本政府深信清廷已病入膏肓，再也不足為心腹之患。但鑑於中國已淪為次殖民地，在列強紛紛進入中國爭相角逐建構勢力範圍之際，為了避免西方列強在蠶食中國後進而直逼日本，提倡中國領土完整，即成為此時刻的日本對華新政策。由於新的對華政策轉變為扶植清廷恢復國內秩序，寄望中國能成為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緩衝地帶，因而此一時期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就不再被日本政府重視，日本政府開始正式切斷對孫中山的援助。

日俄戰爭的結果，讓日本勢力進入中國。如何繼續拓展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就成為日本政府的新指標。為了順利執行此一新目標，日本政府開始放棄提倡中國領土完整政策。此外，更以扶植清廷執政為首要考慮。換言之，日本經由日俄戰爭所嚐到的勝利滋味，使日本政府深信在爭奪中國資源戰中自己已然具備與西方列強一較長短的軍事實力，不需再倡導中國領土完整政策來自縛手腳。再則，當蠶食中國領土主權已成為日本政府既定國策時，日本政府當然不希望中國有所改變。是以，腐化的清廷政府，最足以滿足日本政府的所欲所求。為了維護清廷的執政，日俄戰後的日本政府開始逐步鎮壓以日本為基地的中國革命運動。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保皇政策，這是延續日俄戰後以來的一貫政策；後期是利權外交，日本政府以「貸款」

爲餌，誘使南京政府出賣長江流域之商業特權。

對孫中山而言，義和團之亂以後的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的態度，實非其所樂見。但因受制於中國革命長年無成，對日本政府不得不刻意周旋。不過，日本政府態度的多變以及對革命黨的衆多打壓，皆讓孫中山有錐心之痛。尤其是辛亥革命後期，南京政府爲爭取外援，不得不考慮出售利權之時，日本商家要價之高，宛如趁火打劫。[164]從這些遭遇來看，正凸顯出日本朝野視孫中山爲其對華政策的一支籌碼之基本心態。

不能順利爭取到日本政府的實質援助，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期被逼與袁世凱謀求妥協的關鍵。日本政府不能趁孫中山最需外援之際，與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建立起相互扶持的合作關係，也促使雙方關係一直停留在吳越同舟的瓶頸，完全沒有突破的空間。

本來，從事中國革命的核心幹部，都是嚮往明治維新而來到日本深造，在日本受到文明洗禮，進而投身革命。所以，就中國革命的發展淵源而言，日本必定是革命黨人欲求爭取的第一盟邦對象。可是，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無意變更已然擬訂的鯨吞中國的政策，並一直對革命黨持打壓態度。這樣的事實，當然會逼使以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立爲己任的中國革命運動日後非以日本爲主敵不可。雙方的互不見容，事實上早在日俄戰爭以後雙方關係的演變上，早就呈現端倪。

164 這是當年參與貸款交涉的日本在野黨領袖犬養毅對日本商社的評語。犬養毅，〈支那統一事業の二問題〉，《東西時報》（1912年5月），頁7-8。

徵引書目

一、史料

1. 〈犬養毅ト宮崎寅藏：警視廳ヨリ外務省宛ノ報告書〉，1899年6月2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乙秘第712號，原件。
2. 〈福岡縣知事深野一三發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宛の報告書〉，1900年8月26日及28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高秘第848號及857號，原件。
3. 〈在香港總領事代理船津辰一郎発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壽太郎宛の報告書：香港ニ於テ觀察セル清國革命党〉，1910年8月22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4，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機密第42號，原件。
4. 〈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清國ニ於ケル秘密結社〉，1911年6月，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原件。
5. 〈兵庫縣知事服部一三発外務大臣侯爵小村壽太郎宛の報告書：清國革命党首領渡來ノ件〉，1911年6月12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兵発密第373號，原件。
6. 〈政務局第一課：康有爲ニ関スル件〉，1911年6月20日，收入《各國內政関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党関係（亡命者を含む）》，卷5，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兵発密第1471號，原件。
7. 〈矢野文雄發外務大臣西德二郎宛の報告書〉，1898年5月14日，收入《在本邦清國留學生關係雜纂：陸軍學生の部》，卷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機密第41號，原件。

8. 〈陸軍省軍務局長ノ特使田村大尉持參：清国ニ対スル用兵ニ就テ〉，1911 年 10 月 23 日，收入《清国事変書類》，卷 1，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原件。
9.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卷 29，1954。
10. 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 33 卷別冊 1 北清事變》，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6。
11.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1 Series E Volume25: Suppression of Boxers and Negotiations for China Settlement, August 1900-October 1900.*

二、專書

1.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2.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政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3. 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勸學篇・輶軒語》，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4.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臺北：遠東圖書出版，1982。
5.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1 篇黨的建立與發展》，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
6. 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洪聖斐，《孫文與三井財閥》，臺北：文英堂出版社，1998。
8.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伍）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9. 孫文，《孫文學說》，收入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10.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11.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1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13.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14.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在日本：1895-1914》，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15. 黃正銘，《中國外交史》，臺北：正中書局，1959。
16. 鄒魯，《中國國民黨黨史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17.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18.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19. 中村哲夫，《同盟の時代：中國同盟會の成立過程の研究》，東京：人文書院，1992。
20.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收入北輝次郎編，《北一輝著作集：II》，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
21.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
22. 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東京：原書房，1965。
23. 平山周，《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東京：弘隆書林，1980。
24. 吉野作造，《中國革命史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
25. 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
26. 吉野作造、加藤繁，《支那革命史》，東京：內外出版株式會社，1922。
27.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說》，東京：慶應通信，1982。
28.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原書房，1968。
29. 河原宏·藤井昇三，《日中關係史の基礎知識》，東京：有斐閣，1974。
30. 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
31.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54。
32. 兪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

33.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東京：乾元社，1951。
34. 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
35.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36. 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66。
37. 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傳》，東京：原書房，1968。
38. 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kong: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24.

三、論文

1. 宋教仁，〈我之歷史〉，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宋教仁文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2.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收入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3. 梁敬錞，〈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收入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輯 3 辛亥革命》，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4. 彭澤周，〈關於康、梁亡命日本的檢討〉，收入《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
5.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近代中國》，期 147，2002 年 2 月。
6. 犬養毅，〈支那統一事業の二問題〉，《東西時報》，1912 年 5 月。
7. 犬養毅，〈世界人の横顔(9)：ボロ洋服の孫文にも革命志士の風骨〉，《東京朝日新聞》，1930 年 7 月 21 日。
8. 犬養毅，〈搖籃時代のわが対支方針〉，《大阪朝日新聞》，1928 年 7 月 23 日，收入前揭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伝》。
9. 古島一雄，〈革命中國との因緣：一老政治家の回想(6)〉，《中央公論》，1951 年 2 月。
10. 信夫清三郎，〈廈門事件と惠州起義〉，《政治經濟史學》，號 167，

1980 年 4 月。
11. 柏原文太郎，〈東亞同文會創立時代の霞山公〉，《支那》，號 128，1934 年 2 月。
12.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收入宮崎龍介、小野川秀美編，《宮崎滔天全集》，東京：平凡社，1971，卷 1。
13. 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滿蒙独立運動と小池外務省政務局長の辭職〉，收入栗原健，《對滿蒙政策の一面》，東京：原書房，1966。
14. 梅溪昇，〈孫文に関する數點の犬養毅陸實宛書翰について〉，《日華日報》，1975 年 3 月。
15. 黃自進，〈明治後期における中國像：日本政府の中國革命運動への支援と否定〉，*QUADRANTE*（東京外國語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集刊），期 2，2000 年 3 月。
16. 齋藤聖二，〈廈門事件再考〉，《日本史研究》，號 305，1988 年 1 月。
17. 藤井昇三，〈孫文と『滿州問題』〉，《關東學院大學文學部》，號 52，1987 年度紀要。

To Exploit and Be Exploite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zu-chin Hu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Sun Yat-sen needed a baseand financial support, as well as experie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advanced countries. These were all incentives for him to accept Japanese aid. Due to the support of Japan, Sun was able to merge the various secret societies in South China and became their leader. Japan thus help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its early stage. From the Japanese point of view, China's conventional image as a huge empire had survived the Sino-Japanese War. Furthermore, Japan was anxious at the rumored possibility of a Sino-Russian military coal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revenge from the Qing, Japan chose to support Su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s a containment polic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un and Japan was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could challenge it. Two key events brought about such a change. One was the Boxer Uprising in 1900, and the other was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1905. The Boxer Uprising convinced Japan that the Qing was no longer a threat. Finding that China had become a kind of colony, Japanese policy shif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China from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dismemberment by Western powers. Japan's new China policy switched to support the Qing Imperial House to maintain order, so as to be strong enough to maintain a buffer state between Japan and Western powers. Accordingly, in this period Japan terminated its support to Sun.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Japan further aggrandized her influence into China. The expansion of its special interests in Manchuria became Japan's essential goal. Therefore Japan abandoned its traditional policy of supporting the unity of China,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firmly supporting the Qing government. This is because after its victory over Russia, Japan believed in its capability of competing with Western powers in the dismemberment of China. To meet this purpose, the existence of a corrupt Qing government was to its advantage. As a result, Japan adopted a policy of suppressing the revolutionaries.

As for the period of the 1911 Revolution, Japan's China policy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At first, Japan, following her post Russo-Japanese War policy, backed the Qing Imperial House. Later, Japan proposed a loan to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exchange for commercial privileges in the lower Yangtzu Valley region. Failing to acquire substantial aid from Japanwas a key factor in forcing Sun Yat-sen to compromise with Yuan Shikai.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as well missed its best chance to establish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Sun's revolutionary forces. Their relationship thenceforce remained mistrustful.

Key words: Sun Yat-sen, Japanese Governmen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oxer Upris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